

【图林·史志】

关于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研究

●柯平 刘培旺

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是目录学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此类研究对于目录学可持续发展乃至优秀学术文化的传承具有显著意义。文章在已有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与范畴,阐述了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提出了确定目录学家的标准,总结了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关键词]目录学史 历史人物 目录学家 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845(2023)01-0054-08

[引用本文格式]柯平,刘培旺.关于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历史人物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23(1):52-59

目录学史上所有事件的发生、发展必定依附一定的人物或人群而展开,目录学学科史研究通常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作为史实阐述的主轴,因此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地位不容忽视。近百年来有关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著述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目录学史专著以及文献学、目录学教科书中对部分历史人物进行了介绍;二是全面介绍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工具书,如《中国目录学家辞典》等;三是专门研究目录学历史人物的论文,如傅振伦对于章学诚的研究^[1]、陈光祚关于梁启超的研究^[2]等,卢振波对1994—2003年的研究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3]。文章以1949年来目录学历史人物著述为基础,讨论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四个问题,以期对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提供借鉴。

1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与范畴

1.1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

梁启超曾指出,历史的目的在于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4]。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也大致如此,否则过去的书目以及目录学研究著述已经足够多,若不是抱有新目的,那么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便失去了意义。具体而言,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目的可分成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

不论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以个人还是群体为研

究对象,其微观目的大致集中于探索人物生平,分析人物目录学成就的因由,挖掘人物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贡献,评述或弘扬人物的目录学思想,论证人物的学术影响,窥见中国目录学史的发展流变等几个方面。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微观目的又因时代的不同而略有区别。比如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国内目录学实践和研究也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而以这一时期的目录学历史人物为研究对象者,又有以考察传统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的对立与融合,剖析西学影响下传统目录学的突破与变化,比较传统目录学和西方目录学的优劣长短为直接目的^[5]。而当代目录学家站在中国两千年目录学史基础之上,融汇中西目录学理论和方法,其学术历程自然带有时代性,学术思想呈现出强烈的包容性。

众多单项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共同组成该领域的知识体系,从整个知识体系的视野出发可将宏观目的归纳为:指导目录学实践和研究、促进目录学学科发展、指导读书治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四个层次。其一,目录学史中包含着文献收集、考证、分类、著录等学问,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对理论和方法的挖掘以及对人物学术思想的总结,可以为今天知识分类、书目数据库建设以及其他诸多实践活动提供参考与借鉴,历史人物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思想也可以指导目录学研究的开展。其二,目录学历

作者简介:柯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献目录学、知识管理、图书馆管理;刘培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献目录学、图书馆管理。

收稿日期:2022-12-03

责任编辑:刘意

史人物研究属于学科史研究范畴,可拓展目录学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揭示目录学学科发展规律,完善目录学学术体系,从而达到促进目录学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其三,目录学是读书治学的门径,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通过对考订、分类、提要等原理的呈现,实现指导读书治学的目的。其四,目录学史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每一位目录学历史人物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因此对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生平和学术贡献进行挖掘与展示,也是为了响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发展号召。

1.2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范畴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有一个范畴问题,如是选择一人为研究对象还是选择多个人物为研究对象,是偏重于再现历史人物的书目活动还是倾向于展示历史人物的目录学思想。因此,关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范畴可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去讨论。

现有的目录学历史人物在研究对象方面有两个特征。其一,所关注的历史人物数量相对较少。以1949年来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研究论文为例,专门的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涉及约200人,其中章学诚、梁启超、郑樵、余嘉锡、姚名达、钱亚新、彭斐章、王重民、叶德辉、晁公武等被关注较多。其二,目录学家的选择范畴没有清晰的边界或确定的标准。多数著作重点选择贡献和影响较大的名家为研究对象,多样化的人物选择范畴在现有研究中较为少见。因此,目录学史研究对历史人物的关注还需拓展,具体而言:书目实践、目录学著述及思想的学术核心人物,个性奇特但具有一定目录学成就且值得传承的人物,过去的研究中缺乏记载或记载过于简略的人物,已有研究失实或偏倚的人物,主攻其他学科但与目录学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当代目录学成就较大的人物等都值得被关注。同时,可以从具体时代、学派别、阶级、人格特征等多个方面来确定研究对象。

现有的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在内容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其一,关注人物的生平事迹,此类研究描述了人物所处的时代环境,展示了人物的目录学研究历程,甚至传达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其二,关注人物的目录学成就,此类研究或对人物的目录学著作成果进行概览,或对人物的某一论著进行考察,挖掘人物的目录学理论和方法贡献,展现人物的目录学思想。其三,关注人物的学术影响,该部分研究或直接论述人物的学术影响,或论证某人对后来某人的影响,比如有研究讨论郑樵对余嘉锡的影

响^[6]。其四,关注目录学历史人物在其他学科方面的成就,比如从史学、文献学、图书馆学等角度去论述人物的成就。总而言之,一方面目录学历史人物的专门研究主要关注了人物的目录学活动,大多数研究对人物做出了价值评论,而其中以弘扬长处者居多,对目录学家的理论、方法、思想的局限性讨论较少。另一方面,在重点关注人物学术表现的同时,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也对人物与外在的联系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人物的学缘关系、学术派别、学术传承与流变,但该部分研究内容可以进一步拓展,如当时的政治、文化等人文因素以及天文、地理等自然因素对人物的影响,人物接受或抗拒社会形势的原因,人物的思维定式和行动造成的客观后果等。

2 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

不仅历史学离不开历史人物研究,所有的学科史如哲学史、文学史、经济史、法制史、教育史等都需要掌握学界对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目录学史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耿云志在讲到历史人物研究时,提出要重视“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注意“阶级分析与人物评价”五个问题^[7]。参考史学界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观点,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要有以下基本态度。

2.1 尊重以史料为基础的客观事实

我国一直以来具有良好的史学传统,其中尊重客观事实是治史的基本态度。唐代刘知几对于写史,主张“直笔”“无所阿容”。若“见良直不觉其善,逢抵牾而不知其失”,则学问再多也无用^[8]。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是客观发生的,一方面随着时间延长,相关的客观事实可能由于口耳相传、辗转传抄中发生了差错,或是由于记述者无意地错记或有意地扭曲发生讹误。另一方面,研究者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往往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因而要把尊重客观事实作为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以真实和尽可能完整的史料作为客观存在与主观认识之间的桥梁。发挥目录学研究者的专业特长,充分利用各类目录工具搜集史料,充分发挥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的传统对史料加以考订,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2.2 重视时代和社会对人物的影响

清代章学诚指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9]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总结了前人的此

类观点,认为历史人物研究要把它放进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生产方式之中,还要分析它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它在该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等^{[10]25}。因此,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者要关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学术等背景,分析人物的阶级属性,探索人物的学缘关系,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中去考察,才能有效理解其人物特征和目录学贡献。不能将人物与时代和社会撕裂,不能用今天的技术条件和目录工作去衡量历史人物,也不能用当前的目录学思想去苛求历史人物,否则对人物的研究结果容易变得轻率甚至情感化。

2.3 关注事功或心性中的特长

对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而言,研究的侧重有三种不同形式:兼顾事功表现和心性修养,专注人物事功表现,以及专注人物心性修养。其中,多数研究侧重于探讨人物的事功表现,比如人物的目录工作或目录学研究经历,人物取得的成果及其目录学思想,而专注人物心性修养的研究较少。比如研究目录学家余嘉锡,除梳理其生平学术历程,探讨其学术思想外,还应关注其勤奋好学、廉洁自律的优秀品质和忠贞不渝的爱情观^[11]。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其目录学成就值得学习,但其有缺陷的心性修养以及所推崇的错误价值观不值得被后世学习。如晚清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在目录、版本、考据、辑佚研究方面颇有成就,但因其性格孤傲、言行狂狷,甚至被称为奸商劣绅,因而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以学术而非政治的态度去专门关注其事功表现。因此,若由于历史原因,该人物在目录学成就上的表现形式较为单一,可侧重研究其优良的个人品德和为人处世态度,作为目录学后来者的道德模范;若该人物在学术方面卓有成就,而其政治问题突出或言行为人不齿,也可探讨其目录学贡献,挖掘其长处为当下学术研究工作提供便利。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不能局限于已有的研究或囿于前人的观点,切忌全面否定或全面肯定的态度,避免“盖棺定论”的思维定式^[12],换言之,在事功表现和心性修养任何一方表现较为突出者都值得被研究。

2.4 防止过分的功利主义

一方面,对待历史人物要防止过分的精英观。梁启超指出:“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舍豪杰则无有世界。”^[13]从这个观点来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英雄史,这是一种精英观。现有研究所关注到的目录学历史人物与历史上的目录学人物总数相差较远,研究中对贡献和影响力较大的人物关注颇多,这

也是精英观的表现。因此,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不能仅关注那些影响较大的人物,应当考虑到古时一个人能否成为精英由多种因素决定,比如人物是否被当时政治、文化所认可,人物的目录学贡献有无史传、书目记载,人物的成就是否被发掘和流传。而且,那些不是精英的人物也需要被关注,目录学史专著由于篇幅等各种因素限制通常难以兼顾太多人物,研究论文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应当广泛拓展。另一方面,对待历史人物要防止过分的实用观。梁启超指出:“真能创造历史的人,就要仔细研究他,替他作很详尽的传。而且不但要留心他的大事,即小事亦当注意。”^[14]说明历史人物的研究要关注人物的大小各个方面。现有研究著述理论、方法、思想等目录学成就的类型较多,而专门关注生平事迹、心性修养的方面相对较少,说明研究者们对待历史人物秉承着一种较强的实用观。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一些文史研究者虽然关注了目录学历史人物,但囿于缺乏目录学造诣而将目录学历史人物的思想简化或曲解了,如认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目录学思想的研究却很少见”^[15]这一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目录学研究向来重视史料的完整性。生平事迹类、心性修养类研究虽难以直接指导目录学研究与实践,但仍可作为了解历史人物的材料,从长远来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对于短期内难以预见影响的内容也需要加强关注。

3 确定目录学家的标准

目录学历史人物和目录学家是对历史上目录学者的两种称谓,这两种称谓所代表的群体并非完全对等,因此在历史人物研究时,要判断哪些人物称得上目录学家,就必须解决目录学家的标准问题。

许多目录学著作在论及目录学历史人物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是目录学家,如昌彼得《中国目录学讲义》(1973)、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1984)、吕绍虞《中国目录学史稿》(1984)、昌彼得和潘美月《中国目录学》(1986)、来新夏《古典目录学》(1991)、胡楚生《中国目录学》(1995)等。只有部分目录学著作明确列出目录学家并进行专门研究(见表1),但也没有明确遴选标准。迄今关于“目录学家”的四部工具书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申畅认为目录学史上涌现出上千个目录学家,只要涉及目录学活动、编有书目,都算作目录学家。他主编的两部工具书中,《中国目录学家辞典》收录的2200

余人,实际上是目录学历史人物;而《中国目录学家传略》收录的110人,因没有一个具体的选择标准或依据,存在漏收或收录不当的问题。比如在《中国目录学家传略》中,他将胡适作为目录学家,就因为胡适编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水经注版本目录》《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藏目录》《文字考古学古书目录》,从而得出“胡适的目录学理论是丰富的”^[16]结论。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只收录著名目录学家33人,他虽然提出了目录学选择上“首先考虑的是其学术成就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也考虑到时代代表性和不同阶层人物的代表性问题”^{[17]前言},但这实际是人物入选图书的标准,而不是目录学家的标准。全根先《中国近代目录学家传略》收录目录学家33人,他们主要活动限于1840—1949年,该书强调了这些目录学家所

作出的重大贡献,“他们或毕业从事目录学研究,或将目录学作为其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8]自序},但这些目录学家的选择也没有一个科学的依据。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1993)收录中国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领域著名人物45位,其中被称为目录学家的只有22位^[19]。由此可见,目录学相关著作中对于目录学家的选择是主观且缺乏科学标准的。表1目录学相关著作中出现的重要目录学家有89人,出现2次及以上的有46人,其中,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等累计出现9次;阮孝绪(8)、毋煗(7)、姚名达(7)、余嘉锡(7)、班固(6)、王俭(6)、陈振孙(5)、张之洞(5)、缪荃孙(5)、梁启超(5)也是出现的高频学者。

表1 目录学相关著作中的重要目录学家情况

目录学相关著作	重要目录学家	特点
姚名达《目录学》(1933) ^{[20]120-137}	刘向、刘歆、阮孝绪、毋煗、郑樵、章学诚、纪昀	被称为“特出的目录学家”,介绍其小传、对于目录学的贡献、对于后世的影响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目录学概论》(1982) ^[21]	刘向、刘歆、班固、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马端临、章学诚、姚名达、余嘉锡、容肇祖、刘咸炘、汪辟疆、蒋伯潜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重要著作及其贡献
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1992) ^[22]	孔子、刘向、刘歆、班固、荀勖、王俭、阮孝绪、毋煗、智升、郑樵、焦竑、祁承燦、胡应麟、纪昀、钱曾、黄丕烈、顾广圻、王鸣盛、钱大昕、全祖望、章学诚、姚振宗、叶德辉、张之洞、梁启超、蒋伯潜、余嘉锡、杜定友、姚名达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著述活动及其对目录学的贡献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1993) ^[19]	刘向、刘歆、荀勖、郑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祁承燦、章学诚、缪荃孙、张元济、傅增湘、余嘉锡、李小缘、袁同礼、王重民、钱亚新、姚名达、赵万里、顾廷龙、张秀民、彭斐章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生平与目录学简况
李万健《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1993) ^[17]	刘向、刘歆、班固、郑默、荀勖、道安、李充、王俭、僧祐、阮孝绪、毋煗、郑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王应麟、马端临、焦竑、祁承燦、黄虞稷、钱曾、章学诚、孙星衍、黄丕烈、张之洞、缪荃孙、范希曾、梁启超、余嘉锡、孙殿起、郑振铎、姚名达、王重民	介绍目录学家的生平事迹,从事书目工作的实践及其目录学著作、思想、成就和贡献
李瑞良《中国目录学史》(1993) ^[23]	刘向、刘歆、班固、阮孝绪、毋煗、郑樵、章学诚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活动与著述
倪士毅《中国古代目录学史》(1998) ^[24]	刘向、刘歆、王俭、阮孝绪、毋煗、晁公武、陈振孙、郑樵、章学诚、姚振宗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活动与贡献

目录学相关著作	重要目录学家	特点
余庆蓉、王晋卿《中国目录学思想史》(1998) ^[25]	孔子、刘向、刘歆、班固、王俭、阮孝绪、道安、僧祐、牛弘、毋煗、智昇、欧阳修、尤袤、晁公武、陈振孙、郑樵、马端临、高儒、祁承燏、胡应麟、钱曾、黄虞稷、章学诚、姚振宗、孙诒让、缪荃孙、张之洞、江人度、梁启超、叶德辉、余嘉锡、杜定友、姚名达、吕绍虞、彭斐章、谢灼华、王重民、朱天俊、来新夏、乔好勤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全根先《中国近代目录学家传略》(2011) ^[18]	莫友芝、龙启瑞、王韬、徐树兰、张之洞、范希曾、杨守敬、姚振宗、缪荃孙、康有为、余嘉锡、叶德辉、孙毓修、傅增湘、梁启超、丁福保、王国维、柳诒徵、陈垣、沈祖荣、汪国垣、钱基博、王云五、蒋伯潜、孙殿起、袁同礼、郑振铎、杜定友、孙楷第、刘国钧、谢国桢、王重民、姚名达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生平、学术活动与目录学著述
柯平《中国目录学史》(2022) ^[26]	孔子、司马迁、刘向、刘歆、班固、郑玄、王俭、阮孝绪、僧祐、牛弘、魏徵、刘知几、毋煗、欧阳修、郑樵、晁公武、尤袤、陈振孙、马端临、焦竑、胡应麟、祁承燏、钱曾、王鸣盛、章学诚、姚振宗、缪荃孙、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姚名达、余嘉锡、汪国垣、刘纪泽	介绍重要目录学家的目录学贡献、主要思想及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史学界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思考和探究曾有过多次高潮,也涌现出了不同的观点。孔子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兼顾个人道德修养(“德”)和历史成就(“才”)两项标准,被视为较为科学、全面的标准^[27];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明确提出了“才”和“德”标准,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28];唐代刘知几认为史家应有“史学、史识、史才”三长,而以识为最;清代章学诚在此基础上添加“史德”合为“史家四长”,与“才”和“德”两大要素相对应。这些为讨论目录学家的标准提供了依据。

其一,所谓目录学家,首先要有目录学专长。钱穆认为:“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29]95}，“所谓历史人物,则必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更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29]98} 一个人若可以被称为目录学家,其在目录学方面的事功表现应当较一般的历史人物更加突出。具体而言,目录学家在事功表现方面通常应具有以下某种特点:丰富的目录学研究或实践经历,以及一定体量的成果,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王俭曾为宫廷藏书编《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后对此目录

不满,又用十余年时间撰《七志》^{[22]99};目录学成果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比如汉代刘氏父子撰《别录》《七略》,其首创的六分法成为中国古代的主要图书分类法之一;目录学贡献具有创新性和难替代性,比如在中国目录学萌芽较早、目录众多但长期缺乏理论研究的背景下,郑樵在《通志·校讎略》中总结了目录学的理论与方法,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目录学思想具有启发性和实用性,比如余嘉锡曾以现代的“学科”意识反思目录学的学术价值,对于目录学的学术研究乃至学科发展具有较强的启发性和实用性^[30]。

其二,目录学家作为学者,要有“学德”。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31],被历代众多学者所认可并以此为志向,其中不仅体现着学人的历史使命感,也包含了崇高的道德品质。目录学家或投身目录工作,或深耕目录学研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价值追求,为保存人类知识和指导读书治学贡献良多。目录学家的理论、方法和思想要被推而广之,为后代学人所效仿,其个人品德往往也对后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被称为目录学家的人通常德才兼备,在“德”方面至少具备较高的“学

德”修养。所谓目录学家的“学德”就是在目录学实践、研究或教学中的品德,包含优良的治学动机和学术道德。不同的时代,“学德”有不同的标准,比如古代不少目录学家因在官修目录的修撰中表现亮眼,甚至穷其一生做出成果为当朝统治服务,即治学为忠,符合儒家的道德修养评价标准,是具有“学德”的表现;在近现代,有目录学家治学坚持人民本位,以传播文化知识,推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为目标,如姚名达在《目录学》自序中说本书“给一般图书馆的馆员和读者做一只开门的钥匙用的”^[20]¹,也是具有“学德”的表现;相反,若有历史人物的目录学成果虽具备一定体量,但以蒙蔽、扭曲为治学动机,或以抄袭、造假为学术志趣,对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缺乏创新性洞见,对当时的文明进步起到阻碍作用,则属于“学德”浅薄的表现,不足以称之为目录学家。

从“才”与“德”两大要素出发,目录学家作为一门专门性学问的资深学者,必须具备较为突出的目录学专长和优良的道德品质两个基本条件。进一步,结合目录学的学科特点,目录学家的遴选标准有以下三点:一是要有较高学术水平与影响力的目录学著述,且著述是目录学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在目录学史上,除目录学理论著作外,书目索引众多。周贞亮、李之鼎的《书目举要》汇录汉至清末现存书目270多种,邵端彭、阎树喜的《书目长编》著录书目1300余种,刘纪泽的《书目考》共收书目1470种,梁子涵的《中国历代书目总录》收现存中文书目文献1600多种^[32]。如此大量的书目并不是都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与影响力,不能简单地将编有书目或索引的人当作目录学家。二是在重要书目活动中有突出贡献,对书目事业发展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例如,清《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先后有360名学者和目录学家参加,皆一时名流”^[22]²⁸⁷,将参加过书目活动的学者都算作目录学家,显然是不合理的。据冯秉文的《全国图书馆书目汇编》记载,1949—1957年各类图书馆所编书目和索引2359种;另据柯平统计,1949—1992年我国编辑出版的书目索引单行本共7682种^[33]。无论是历代政府组织的书目活动,还是当代图书馆、出版发行、文献中心等机构组织书目活动,参加的书目工作者众多,只有在这些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并取得显著成就的人才具备成为目录学家的条件。三是在目录学理论或方法上有创见的目录学思想并对后世目录学产生影响。能称得上目录学家的,往往有重要的目录学思想,这些思想

可能分散于各种著述之中,但一定是对于目录学知识的提炼,既包括实践和方法的总结,也包括对于文献及书目活动的认识。

显然,表1所列重要目录学家,最多有40位,最少有7位,都是符合上述标准的。以往对于目录学家有不同的认识,主要是缺乏统一标准。以康有为例,余庆蓉、王晋卿认为他“不是目录学家”^[25]²³²,却详细阐述了康有为在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按上述三个标准,康有为不仅有重要著述《新学伪经考》《日本读书志》等,也有书目编纂活动^[34],还有突破封建目录学的思想^[35],应当称之为目录学家。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很多符合以上标准的目录学家没有得到认可和研究,全面认识符合这些标准的目录学家并展开深入研究是未来目录学史的重要任务之一。

4 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的内涵比较广泛,除研究方法外,关于怎样进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论述都可算作方法论的范畴。现有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史料法为主,通过对史料的查找、收集,再加以考证、分析,最后得到研究结果或结论。实际上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中既有传统的又有新兴的,并且可以多种方法配合使用,本部分将具体从三个角度对方法论问题做简单的列举和论述。

其一,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可以采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历史分析法的目的是通过整理、排比史料,辨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展示历史发展过程,论定问题之是非。可参考借鉴史学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阶段论、方面论、综合论等分析方法^[36]。比如,要研究某位目录学家编撰目录的历史背景、文学与史学发展对目录编撰是否存在影响,目录编撰过程中他做过哪些工作,以及目录工作的结果,就可以采用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的目的是通过抽象与概括、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具体方式,把复杂的材料上升为概念的认识,形成历史的理论体系或逻辑体系,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10]¹⁰³。比如,要研究某个目录学群体书目工作本质性和规律性的内容,探索目录学群体的自然观、学术观,就可以通过逻辑分析法将材料上升为概念认识,加以逻辑判断和推理,从而发掘该目录学群体的书目工作对当时社会的史学、文学、科技发展的作用。要研究目录学家,不能停留在目录学家从事书目活动或著作的

表面现象上,必须探讨其目录学思想及影响,只有经过科学的逻辑分析与深入的思考发现,才能避免“以目录学家的具体工作作为目录学家的思想,以目录学家的贡献替代目录学家的思想”^{[26]23}。阶级分析方法是指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划分为阶级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37]。比如,要通过目录学历史人物的书目实践和目录学思想主张所反映出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来评价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时,可以采用阶级分析法。

其二,根据研究对象数量的不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可以采用个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社会网络分析法等。个案研究法是现有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主要的研究方法之一,研究对象为单个历史人物,研究内容可以涉及目录学人物的理论、实践、思想等多个方面。比较研究法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该方法通常用于二者相似性或相异性的比较,比如两个历史人物、两个学术派别或两个时代的目录学比较,偶尔也用于多者之间的比较。社会网络分析法,按照米切爾的定义,指特定人群中的一整套具体的联系,这种联系有一个额外的特征,即这些联系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用来解释其中人们的社会行为^[38]。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用这一方法研究当时人物所在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人物属性,找出其中重要的或突出的历史人物,解释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学术发展联系、递进、继承等内在关系,分析人物对学术发展的影响,展示目录学理论和思想的发展流变等,应用该方法既可以着眼于历史人物的个人层次,又可以着眼于群体层次。

其三,根据研究方法技术手段的不同,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可以采用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数字人文方法等。调查研究法是通过考察客观情况来获取有关材料,并对这些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具有不受时空限制、操作难度较低等优点,主要有文献调查、访谈、问卷调查、邮件调查等各种材料收集方式。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对各类古籍、研究著述进行收集,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对当代人物进行调查来收集关于历史人物的材料,从而辅助研究的实施。内容分析法是一种能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在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等领域中常常被用于人物研究。在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可以借助内容分析法研究人物的行为、贡献,分析人物的动机、人格和形象等多方面内容。数字人文是充分运用计算机技术与人文知识相

互交融的一套跨学科方法论,通过计算、分析、可视化等手段重塑人文知识,提供更多宏观性、趋势性的研究线索^[39]。数字人文方法在目录学的历史人物研究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比如将数据库、图像识别、数据挖掘、神经网络与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与史料结合,探索人物的社会关系、人物作品的版本关系、人物的学术历程、交游足迹等诸多内容,呈现出目录学人物(文献或书目)数据库、作品文字识别与版本校勘、人物社会关系网络、地理信息图谱等不同形态的研究成果。

关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除了上述提及的几类,还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者的客观条件进行选择。总之,要加强跨学科的方法论学习,挖掘更多优质的方法为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所用。

5 结语

在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中,对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的个体研究必然要上升到群体的研究,特别需要有关目录学历史人物的宏观研究以及经验总结。本研究指出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目的可以划分为微观目的和宏观目的,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两个角度指出了目录学历史人物的研究范畴;提出在研究中对待目录学历史人物要尊重以史料为基础的客观事实,重视时代和社会对人物的影响,关注人物在事功或心性中任何一方的特长,防止过分的功利主义;指出目录学家需要具备“才”与“德”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具备目录学专长和“学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目录学家的三个遴选标准;最后,从三个角度提出九种可用于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以期有助于目录学者及其他有志于目录学的学人,壮大目录学史知识体系,繁荣目录学学科建设。

参 考 文 献

- [1] 傅振伦. 清朝目录学家章学诚[J]. 史学史资料, 1980(1): 12-14.
- [2] 陈光祚. 梁启超的目录学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J].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63(4): 156-171.
- [3] 卢振波. 近十年来目录学历史人物研究分析[J]. 图书与情报, 2005(2): 29-32.
- [4]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93.
- [5] 王美玲. 刘咸焯目录学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2: 1.
- [6] 史小军, 潘林. 从《目录学发微》看郑樵对余嘉锡目录学思想的影响[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2(12): 79-83.
- [7] 耿云志. 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J]. 史学理论研究, 2020(6): 10-17.

- [8] 侯官响. 假作真时,真伪谁知——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思考[J]. 文教资料,2010(33):86-87.
- [9] 章学诚. 文史通义:内篇二 文德[M]. 北京:中华书局,1956:59.
- [10] 赵吉惠. 历史学方法论[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 [11] 余淑芬. 目录学家余嘉锡[J]. 励耘学刊(文学卷),2008(1):272-276.
- [12] 刘克辉. 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J]. 史学月刊,2005(11):91-97.
- [13] 张品兴. 梁启超全集[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354.
- [14]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47.
- [15] 张永伟,谢琛.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的目录学思想[J]. 黑龙江史志,2011(5):38-39.
- [16] 申畅. 中国目录学家传略[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235.
- [17] 李万健. 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传略[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
- [18] 全根先. 中国近现代目录学家传略[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 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 [20] 姚名达. 目录学[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 [21]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目录学概论》编写组. 目录学概论[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4-81.
- [22] 乔好勤. 中国目录学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 [23] 李瑞良. 中国目录学史[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 [24] 倪士毅. 中国古代目录学史[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 [25] 余庆蓉,王晋卿. 中国目录学思想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 [26] 柯平. 中国目录学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 [27] 万庆. 试析孔子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J].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5(11):91-92.
- [28] 刘江. 从“智伯之亡”看人才选拔[J]. 决策探索(上半月),2016(12):66.
- [29] 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30] 高旭. “曲尽其源流,以备学术之史”——余嘉锡目录学思想探析[J].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47-452.
- [31] 李元存,潘先银. 浅析张载的“横渠四句”[J]. 汉字文化,2021(20):43-44.
- [32] 柯平. 文献目录学[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58.
- [33] 柯平. 书目情报系统理论研究[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234.
- [34] 孟昭晋. 康有为的书目实践活动[J]. 图书馆杂志,1991(4-5):9-12,20-22.
- [35] 孟昭晋. 康有为的目录学思想[J]. 图书馆论坛,1993(4):16-20.
- [36] 李振宏. 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351-352.
- [37] 程金良. 对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二重性理解——《共产党宣言》解读[J]. 理论导刊,2006(11):36-38.
- [38] 戴维诺克,杨松. 社会网络分析[M]. 李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18.
- [39] 潘雨亭. 古籍文献中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2020:14.

A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ibliography

Ke Ping Liu Peiwang

Business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bibliography i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ield of bibliography history.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bibliography is signific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bibliography and the inheritance of excellent academic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bibliograph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purpose and category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bibliography, and puts forward the basic attitude towards historical figures in bibliography,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bibliography scholars, and finally summarize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figures in bibliography.

Keywords Bibliography history; Historical figures; Bibliographer; Methodology